



懷仁之驛

半年刊

魯汶南懷仁基金會 • Vlamingenstraat 1 • B-3000 Leuven

2024 年 7 月 • 第 36 期

內容摘要

社论	1
Hugo Vanheeswijck	
教会与社会	3
韩德力神父	
德凯塞尔枢机参访中国教会	6
编辑组	
南怀仁基金会重启与中国教会的牧灵交流活动	10
龚志喜	
中国连续祝圣三位主教	13
编辑组	
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	15
编辑组	
252 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中国北部的墓园	18
韩德力神父	
庆祝农历中国年	23
佳播	
中国四旬期：受福音启发答复穷人的呼声	25
佳播	
我受洗的故事	27
崔有龙	
我的领洗感悟	27
胡奥斯定	
第十五届南怀仁研究中心国际论坛	29
南怀仁基金会 — 使命宣言	30

尊敬的南怀仁基金会的朋友们：

在 2023 年 12 月的上一期中，我们详细报道了中国主教代表团对比尔时的访问。去年 9 月，我们非常荣幸接待了中国主教代表团。本期《懷仁之驛》夏季版比平时晚发给您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想继续对上一次的访问做后续报道。自 6 月 7 日至 6 月 14 日，南怀仁基金会主席德凯塞尔（Jozef De Kesel）枢机、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普库塔神父（Charles Phukuta）与比利时主教团前任秘书科恩斯（Herman Cosijns）蒙席，在南怀仁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会成员韩德力神父的陪同下访问中国天主教。南怀仁基金会组织的这次访问，可以视为鲁汶南怀仁基金会与中国教会之间的交流向前迈进了一步，和继续对话的成果。这次访问所传递的信息可以用德凯塞尔枢机以下的话来概括：“信仰与社会、教会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想强调政教间的分离：教会没有政治权力，管理人民不是她的范畴，而是政府的责任。但是，如果政教是分离的，但信仰和社会不可分离，基督徒不是一个与社会保持距离的秘密组织。恰恰相反，基督徒始终都是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与所有善意的人团结一致，致力于建设一个公正和人道的社会。”



德凯塞尔枢机（De Kesel）在北京北堂与北京总主教李山共祭弥撒

我们“保持开放”态度的另一个成果是正式重启了牧灵培育活动。自4月8日至5月10日，我们非常高兴地再次接待了中国14个教区的22位神父和两位在欧洲服务的修女，他们再度接受牧民培育课程。这次春季班是在疫情中断后，应中国主教的极力要求，在德凯塞尔枢机的批准下再次举办。龚玛竇神父对这次的活动做以下概述，并配以许多图片。

我们密切关注中国教会的发展，在本期中报道了今年年初中国祝圣了三位新主教。在阐述这些事件后，Michel Chambon对此展开了清晰的分析，让我们深入地了解这一事件对中梵之间对话的意义。

在庆祝1924年上海主教会议百周年之际，宗座传信大学于2024年5月21日组织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人们记得刚恒毅总主教如何孜孜不倦地工作，尽管难乎其难、阻力重重和迁延时日，确保基督的福音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实现信仰本地化。那时候，他鼓励中国的主教和神父担负起领导本地教会团体的责任，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南怀仁基金会认为，上海主教沈斌与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2024年5月大会期间的演讲具有历史意义。自从毛泽东于1950年代与梵蒂冈断交以来，梵蒂冈与中国教会两位最高级别的领导从未以如此正式的方式表达过他们的立场。

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甚至在这样一个国际会议上公开宣讲，这本身就是一项成就。如果没有教宗方济各在2018年与中国达成的临时协议，将永远无法实现。在本期《懷仁之驛》中，我们刊登了1924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主教会议，以及教宗方济各、帕罗林枢机和沈斌主教的重要讲话。南怀仁基金会也在寻求如何与中国的对话做出贡献。我们也会提及关于学术会议的主题“世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这也是我们做的一个范例。

我们的学术研究和出版项目每天都在增长，今年已经新出版了两本《鲁汶中国研究》丛书，枢机主教的中文译本很受欢迎，另一本优秀的出版物即将完成，详细介绍了252位圣母圣心会神父在中国去世的历史。韩德力神父在他的文章中描述了他们如何选择去中国，选择服务中国人、并与中国人一起生活。他们的牺牲与奉献依然为今天的我们传递着强有力的信息，这是友谊、爱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信息，此文章是基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见证了中西方之间存在着爱的锁链。

在我们上次《懷仁之驛》的期刊中，我们只能稍加暗示2024年的学术会议。而本期中，我很高兴让大家有进一步的了解，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非常忙碌的准备这次学术会议。我们以韩德力神父撰写的一篇关于教会与社会间的对话作为本期刊的开场篇，它是一篇非常重要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的文章。韩德力神父从中国传教士的角度，结合德凯塞尔枢机关于“世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一书的内容，完美地阐述了我们与北京的对话。此书将成为2024年9月3-6日在鲁汶大学报告厅举行的国际会议的主题内容。为了描述这次会议的主题和宗旨，我引用多玛斯（Thomas Halik）在《基督宗教的下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历史上，上主把祂的信、望、爱显示给人，即使是生活在教会边缘、以及那些明显被束缚的人。人们在‘万事万物’和所有人类历史中都在寻求上主，我们的生活不再专注于单一性，而将其转化为开放式的对话。”

我们用一篇关于中国新年的文章结束本刊，我们今年年初在中国仁义书苑庆祝了农历新年。佳博修女会让大家深入了解典型的中国习俗，并指出现今中国天主教徒如何庆祝新年。不管怎样，中国的教会依然不断的成长，她也会在另一篇文章论述中国天主教徒如何过四旬期？随后，会具体与各位分享“新受洗的天主教徒接受洗礼的信仰之旅？”作为本期刊的结束。

亲爱的读者，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持对话，这种举足轻重的态度，会带领我们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向光明，我们还会跟踪报道。

南怀仁基金会常务秘书：Hugo Vanheeswijck

教会与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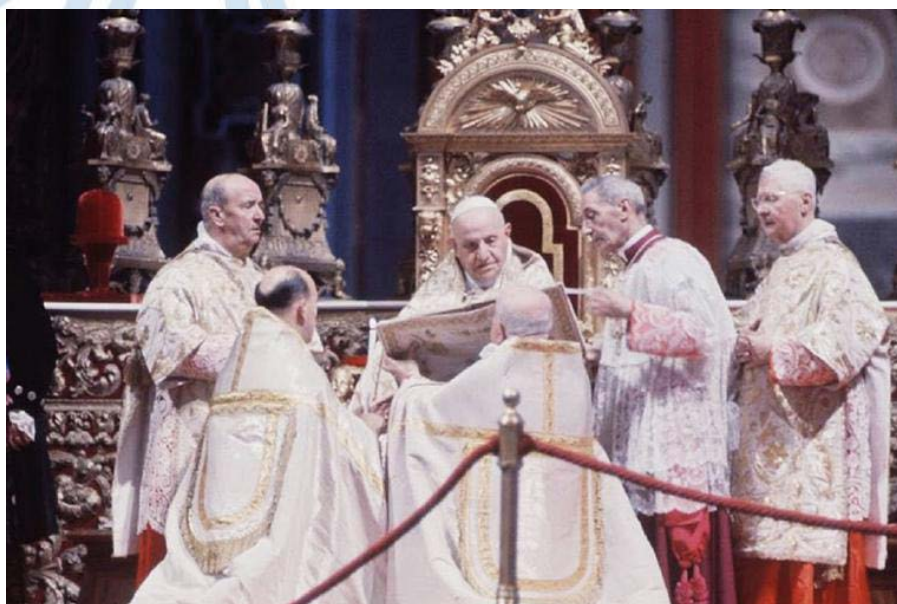
2024 年 9 月，第十五届南怀仁研究中心国际学术会议主题 基于德凯塞尔枢机的著作

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会成员：韩德力神父

“教会与社会”是召开梵二大公会议三年期间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当时，世俗化已经日趋严重，教会在社会中感到孤立无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大公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指出教会需要新鲜空气进来，“与时俱进”（Aggiornamento）是大公会议教长们普遍使用的关键词，从此称教会为“天主的子民”，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大公会议的许多文件中建议，实现与时俱进的方法就是“与社会对话”，此主题在大公会议中多次重复，1965 年大公会议结束时达到了高峰，签署了〈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的牧职宪章〉《喜乐与希望 / Gaudium et Spes》。大公会议呼吁天主的子民应与所有不同的处世哲学、不同的宗教以及无神论进行对话。同年，教宗保禄六世撰写《他的教会》（Ecclesiam Suam）通谕明确讨论了对话主题，自此，对话进入教会历史，教会为开展对话和促进宗教自由所做的努力大大改变了教会在社会中的形象，但这或许并没有达到许多人的预期。

大公会议六十年后的 2021 年，德凯瑟尔枢机出版了《世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一书。当时的欧洲社会，事实上整个世界已经完全世俗化了：对宗教和信仰漠不关心，甚至反对。作为羊群的牧人，枢机在书中公开提出了一个困惑所有信友思想和心灵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这种对我们的宗教与信仰的偏见，咄咄逼人的态度，甚至反对宗教与信仰？”难道我们不应该公开反对世俗化，拒绝世俗化，对抗那些鼓吹世俗化的人吗？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对旧时代的教会有着美好的回忆说，我们为什么不尝试恢复旧时代的教会呢？但这现实吗？这是问题的正确答案吗？而且，既反对世俗化，又想复兴教会的老路，岂不是会使教会在社会中更加孤立吗？

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德凯瑟尔枢机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不与世俗化对抗，而是与之对话！这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参与使其成长和发展。我们不应该排斥它，而应该接受它，将其视为我们自己的社会，我们希望在其中发展和生活。我们需要发展一种与社会对话和接触的文化，而不是与社会对抗，这就是枢机今天向天主教徒传达的核心信息。他这本很薄的书对教会未来几



教宗若望二十三在开幕式上致辞（图片来自国家天主教登记册）



德凯塞尔枢机



十年的牧灵和福传工作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但要实现这一切，我们必须在福传方法上培养一种新的态度，这将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对话的含义。有些信友认为，与无神论者对话的人就是在放弃自己的信仰，事实恰恰相反，我们要求宗教自由，要求在当今社会公开见证我们信仰的自由，我们拒绝宗教与信仰在人们的私人生活中被禁止和孤立。但我们对话的第一步是聆听我们的对话伙伴，也许我们并不完全理解他们的意思。我们希望消除可能存在的偏见（…），更好地理解他们，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是如此（…）。我们希望他们也能聆听我们的意见，以澄清他们自己的偏见，但决定权不在我们自己手中，这取决于他们的回应。

那么如何传福音呢？当我们与世俗化社会对话时，我们还能传福音吗？很显然，我们希望传福音，我们今天不会像过去那样一再重申，“我们希望我们国家的每个人都成为天主教徒”。这听起来有点强硬，会激发攻击性的反应，何况这并不现实，而且缺乏对那些选择无信仰者自由的尊重。对话需要一种相互尊重及聆听的态度，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社会中积极寻找那些对宗教和信仰感兴趣的人。我们希望与许多有信仰，但生活在一个对宗教与信仰抱有敌视态度的社会中，同不敢公开承认信仰的人们取得联系。我们与他们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聚会，在聚会上谈论信仰，只要“天主的子民”成功地公开采取上述态度，那将是教会历史新纪元的开始：一个具有适应世俗化社会的新牧民态度的教会。

2021 年，我以南怀仁基金会、中国传教士的身份与视角阅读了德凯瑟尔枢机的著作，我立刻感觉到，《信仰与宗教》一书的内容完全符合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宗教问题上的对话，包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华人团体进行对话，并不是说共产党人会同意这本书的内容，他们不会，但他们会认同对话的态度。这就是为什么南怀仁基金会决定将该书翻译成中文，并获得版权，以繁体字和简体字出版。该书目前已有法文、荷兰文、英文、意大利文和中文版。

但还不止于此，南怀仁基金会还决定将“教会与社会”作为第 15 届南怀仁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该会议将于 2024 年 9 月 3 日至 7 日举办。在上次第 14 届国际学术会议上，南怀仁基金会仅探讨了有关中国天主教史的论文。南怀仁基金会决定，作为一个与中国对话的基金会，未来也将讨论与“教会与社会”主题相关的议题。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主席德凯瑟尔枢机，以他的著作为南怀仁基金会的学术研究项目，开启了一项丰富多彩且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

9 月份学术会的筹备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已经与东西方的专家学者取得联系，学者们已收到了该书。邀请那些报名提交论文的学者每人就《信仰与宗教》一书中的一个主题发表演讲，并从各自的国家、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出发对该主题做出回应。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演讲者们还在报名，到目前为止，已有 25 位东西方的学者接受现场或线上发表论文，目前已注册的演讲者有来自比利

时、荷兰、瑞典、意大利、澳大利亚、美国、印度、中国（10 位）、香港（4 位）、新加坡、菲律宾等。

以下是 25 名注册中的部分演讲者：

Cardinal Jozef De Kesel（德凯瑟尔枢机，马林教区，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Dom Bernardus Peeters OSB（熙笃会总会长，神父）

Prof. Fr. Thomas Halík（布拉格查理大学教授，神父）

Mgr. Jan Hendriks（哈勒姆，阿姆斯特丹主教，）

Dr. Hugo Vanheeswijck（南怀仁基金会执行秘书）

Fr. Charles Phukuta CICM（圣母圣心会总会长，南怀仁基金会董事会副主席）

Prof. Sr. Helen Alford（教授，修女）

Prof. Fr. Michal Paluch（宗座圣多玛斯大学教授，神父）

Archbp. Th. Menampampil（印度总主教）

何光沪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

Prof. Erik Borgman（荷兰蒂尔堡大学）

Prof Peter De Mey（鲁汶大学神学系教授）

“教会与社会”是梵二会议的中心议题，也是教宗方济各的优先选项。《宗教与信仰》一书吸引了所有天主教徒、神父以及教宗和世界主教会议“共议同行”（Synodality）时对此主题的关注。鲁汶南怀仁基金会感谢董事会主席德凯瑟尔枢机向我们提出这一新的挑战，以便加强我们的教会与现代社会展开更多的对话。我们深信第十五届南怀仁研究中心国际学术会议将在这方面做出重大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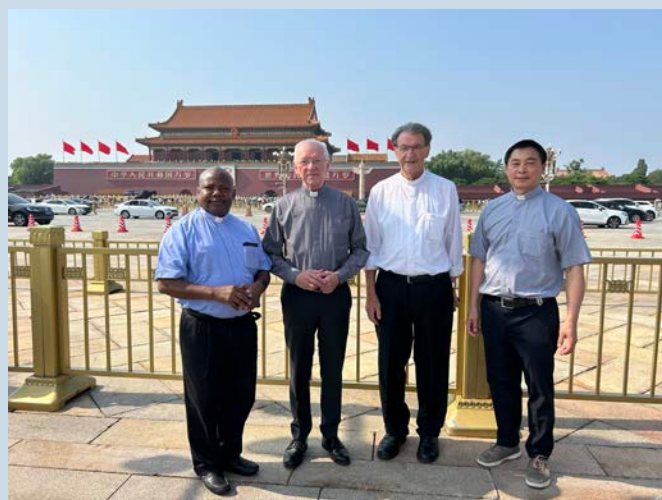
Hugo Vanheeswijck 赠送 Hendriks 主教
德凯瑟尔枢机著作的中文译本

德凯塞尔枢机参访中国教会

编辑组

6月7日星期五，德凯塞尔枢机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参加由鲁汶南怀仁基金会组织的中国参访活动。枢机主教早已在2020年受邀访问，但由于新冠大流行，无法实施。疫情过后，中国主教们再次主动邀请枢机作为南怀仁基金会主席访问中国教会。陪同枢机的有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普库塔神父（Charles Phukuta）、比利时主教团前秘书科恩斯（Herman Cosijns）蒙席、南怀仁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会成员韩德力神父和龚玛窦神父一起圆满完成了此次访问。

枢机及其代表团在北京参访了“中国主教团”。在那里，他们继续就牧灵合作、与鲁汶大学的学术研究、以及文化交流等项目的合作交流进行了对话。22位中国神父于今年4月参加由鲁汶南怀仁基金会组织的牧灵交流活动，标志着该活动已经重启。春季班也到罗马朝圣，并被教宗接见。



圣母圣心会普库塔神父（Phukuta）、德凯塞尔枢机、科恩斯蒙席（Cosijns）与龚玛窦神父在天安门



代表团在中国主教团



在北京与中国主教团会面



科恩斯蒙席、德凯塞尔枢机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承德教区郭金才主教



在北京主教座堂，枢机与李山主教共祭弥撒

6月9日星期日，德凯塞尔枢机与北京教区主教李山在北京主教座堂共祭弥撒。现在，共祭弥撒已不再是问题，因为教宗方济各承认了中国的所有主教。然而，“主教团”尚未得到承认（因为非官方的地下主教还不是主教团成员）。



德凯塞尔枢机把他的书赠予北京教区，
枢机旁边的是李山总主教



普库塔神父在北京主教座堂共祭弥撒



德凯塞尔枢机在全国修院受到热烈欢迎

枢机就他的著作《世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在北京全国修院发表演讲。该书最近由南怀仁基金会翻译并出版了中文版。将作为今年9月鲁汶举办的第十五届国际学术论坛的主题。演讲者来自东西方，参会者包括一位中国主教和其他中国学者。这是自1982年基金会成立以来就已开启了对话之路，因此，南怀仁基金会将继续与中国对话。



代表团与北京全国修院修生合影



德凯塞尔枢机在全国修院演讲

枢机访问了圣母圣心会以前在内蒙古的传教区：呼和浩特和乌蒙，在两个地方共祭感恩圣祭。



代表团在圣母圣心会陶福音主教（Otto）和葛崇德主教（Van Dyck）墓前合影



在呼和浩特，受到教友们的热烈欢迎



在乌蒙，受到教友们的热烈欢迎



在呼和浩特与孟庆禄主教会面



在乌蒙，德凯塞尔枢机赠书给姚顺主教



参观北京古观象台，
耶稣会南怀仁神父制作的天文仪器。



比利时驻北京大使馆人员欢迎代表团



在栅栏墓地入口



代表团在耶稣会南怀仁神父墓前



6月13日，统战部接见了代表团，枢机会见中国官方代表。



南怀仁基金会重启与中国教会的牧灵交流活动

— 记南怀仁基金会第六期牧灵进修班 —

龚志喜

南怀仁基金会于2024年4月8日至5月10在鲁汶仁义书苑举办第六期春季牧灵进修班。中国14个教区的22位神父、以及在欧洲服务的两位修女参加了该进修班。

从2015至2020年，南怀仁基金会每年为中国神父、修女、会士及教友组织春季和暑期牧灵进修班。该进修项目提供牧灵、天主教教理、成人慕道班、天主教社会伦理、讲道学、人格成长、灵修、圣经、以及朝圣和参访等活动。这些课程在堂区福传工作中非常实用，但这些课程在修院培育中相对比较薄弱，有的甚至从未接触过。遗憾的是，该活动自2020年起由于新冠疫情被中断。2023年疫情好转后，南怀仁基金会便立即着手重启这些进修活动。这项活动也受中国主教们的支持，并得到南怀仁基金会董事长德凯塞尔枢机的许可。在南怀仁基金会同仁的努力下，今年终于得以重新举办5周的活动。其内容包括圣经、牧民灵修、天主教社会伦理、沟通的教理讲授、成人慕道班、以及一周的罗马朝圣。

第一周邀请台湾方济各会会士、辅仁大学神学院副教授林思川神父讲授了《若望福音》中耶稣的“临别赠言”。林神父从一个新的圣经视觉并结合他的堂区牧灵经验，栩栩如生的讲解让学员感到非常受用，祈祷、团体共融、重新被召叫等主题，为这些堂区神父们提供了宝贵的牧灵经验。

天主教新鲁汶大学神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天主教研究中心研究员任安道神父在第二周讲授牧民灵修。任神父通过反省、讨论、分享、练习、以及祈祷的方式，从当前社会及教会处境、教会训导、神学、牧民及福传的新方式出发，着重探讨普遍（不限于神职人员）的牧民职务、原则与方法应有的灵修实践。让学员掌握了一套新的堂区福传方法——福传细胞，并以“读经福传细胞”为例，展现了“相遇款待性空间”的教会团体模式。

第三周龚玛窦神父介绍天主教社会伦理，



春季班参加者与圣母圣心会普库塔神父、韩德力神父、Koh 伯多禄神父与范雨果（Hugo Vanheeswijck）教友。



方济各会林思川神父在讲课



耶稣会任安道神父在讲课

该课题在修院培育中比较匮乏。龚瑛神父通过介绍天主教社会伦理概论、史源和发展、基本原则、以及所关注的家庭、环境、工作等主题，让学员了解天主教社会伦理在堂区牧灵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工作与福传的关系。

牧灵进修班的最后一周由杨佳播修女讲授“沟通领域中的教理讲授”，杨修女介绍了耶稣会神父 André Fossion 的教理讲授学——“沟通”模式的教理讲授，将天主教教理放在“沟通”的架构下，归纳出教理讲授的几种模式：初传模式、慕道模式、人类学模式和历史先知模式，分析这些模式的演化轨迹与逻辑，以及当代教理讲授运动所具有的共识以及其中的冲突和张力。此外，杨修女还介绍成人慕道团，探讨如何与慕道者一起聚会、一起追求、一起分享信仰旅程，从而产生参与和互动，使团体达到信仰生活化。

学员们还到罗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朝圣活动，参观了罗马的四大殿及古罗马的历史遗迹，其间还参访了罗马华人堂区、圣艾智德团体、传信部，在圣伯多禄大殿与切里总主教（Archbishop Claudio Celli）共祭弥撒等，还到圣五伤方济各的家乡（亚西西）朝圣。整个朝圣周以 5 月 1 日周三教宗方济各在保禄六世大厅的公开接见达到高峰，所有成员有幸面见这位慈祥的教宗，大家激动万分，喜乐融融。

周末安排了一些集体参访活动，从而了解比利时及周边地区的教会历史、文化、教会活动等。如：参观鲁汶大学；在达弥盎墓地小堂朝圣并举行开幕弥撒；参访德国圣奥斯定圣言会、华裔学志、中国中心以及科隆大教堂，并受到中国中心主任万神父（Martin Welling）的热情接待；参观荷兰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圣母圣心会母院，了解圣母圣心会在中国的传教历史；学员也参访了位于安特卫普的圣艾智德团体并受到热情接待，每位亲身感受了基督的精神——为穷人服务。耶稣升天节，学员们参观了被誉为“北方威尼斯”的布鲁日，观看圣血游行，此游行始于十三世纪末，是比利时最大教会庆典之一，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和信徒前来观赏和朝拜。对于很少有机会到欧洲的中国堂区神父们能亲眼目睹这个盛大的游行感到非常震撼。

5 月 10 日，南怀仁基金会创办人韩德力神父，为 2024 春季牧灵进修班学员在欢快喜乐的



神父团体与切利（Celli）总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



晋见教宗

气氛中发结业证书，基金会主任 Hugo 致信祝贺。学员们将带着满满的收获和祝福返回中国，回到他们各自的牧灵岗位，并以新的精神继续他们的福传事业。这项活动的圆满开展，也标志着南怀仁基金会为中华教会的服务活动在疫情后得以正式重启。



班纳（Banneux）朝圣



班纳（Banneux）朝圣



在布鲁塞尔司各特，神父团体与普库塔神父和玛尔定神父（Martin Mvibudulu）共祭弥撒。



南怀仁基金会收到漂亮的礼物



在德国克隆，圣言会万神父（Martin Welling）接见神父团体。



在鲁汶圣达米盎神父地下圣堂



韩德力神父给参加者介绍圣母圣心会南怀义神父的灵修

在一周内中国连续祝圣三位教宗方济各和中国政府批准的主教。我们希望通过梵蒂冈新闻向读者介绍这三位新主教。随后，我们将刊登 Michael Chambon 部分采访内容，他对当前形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梵蒂冈新闻）

郑州教区主教——王跃胜

王跃胜神父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被祝圣为中国河南省郑州教区的新任主教。教宗方济各去年 12 月 16 日任命王跃胜神父为主教。根据圣座新闻室简报提供的消息，王跃胜神父于 1966 年 2 月 27 日生于河南驻马店，1987 至 1993 年在中南神哲学院完成哲学和神学课程，1993 年 10 月 17 日，在汉口晋铎，曾在郑州担任本堂神父，自 2011 年 12 月起，他在郑州惠济区任主任司铎。



郑州教区

（信仰通讯）回顾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教会生活开始恢复后，郑州教区再也没有主教，只有教区署理（或教区长）。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郑州教区修复或新建了多座圣堂。教会活动持续蓬勃发展，但却没有恢复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繁荣景象。当时，郑州四百万人口中，天主教徒达两万之众。综合各种资料来源报道，今天的郑州人口翻番，天主教徒人数大约在一万到两万之间不等。

潍坊教区主教——孙文君

孙文君神父于 2024 年 1 月 29 日被祝圣为中国潍坊教区主教。教宗方济各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任命他为主教。孙文君主教生于 1970 年 11 月 1 日，1989 年至 1994 年就读于上海佘山修院。他于 1995 年在北京西什库教堂晋铎。随后，2005 至 2007 年，在山东省从事牧灵服务。2007 至 2008 年在爱尔兰继续深造。随后回到潍坊，继续履行其司铎职务。



潍坊教区

2023 年 4 月 20 日，教宗任命孙文君主教为新的潍坊教区主教，取代了原来的益都县监牧区。潍坊教区的主教座堂位于潍坊市青州市的基督君王堂。潍坊教区的地域与潍坊地级市的地域相符，约有 6000 名天主教徒，10 位神父和 6 位修女。

邵武教区主教——吴奕顺

2024 年 1 月 31 日，吴奕顺神父在南平市建阳区城关教堂被祝圣为邵武（闽北）教区主教。教宗方济各于 2023 年 12 月 16 日任命他为主教。

吴奕顺主教于 1964 年 12 月 7 日出生于福建，在上海佘山修院就读哲学和神学，1992 年 8 月

15 日晋铎，属厦门教区。之后，他被派往闽北，在那里开展牧灵工作，担任南平堂区主任，负责邵武和建瓯宗座监牧区。

接下来是研究中国多年的神学家和人类学家 Michel Chambon，将详细介绍邵武教区，并对中梵关系的现状进行评估。（全文采访来自天亚社网，2024 年 2 月 1 日）。

吴奕顺神父于 1 月 31 日被祝圣为邵武教区主教，他的祝圣对于教区的天主教徒有何意义？

我认识吴神父多年，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也是一位很有智慧的神父，自 2013 年以来，我一直在闽北监牧区做实地考察，因此对那里很熟悉。根据中国当局的划分，闽北教区由福建省北部的三个教区合并而成，这是一个正在飞跃发展的山区。在吴神父 25 年多的司铎生涯中，他是一位非常低调、谦逊、活跃和有爱心的神父，他很友善且很有幽默感。他在国内有丰富的牧灵经验，还多次出国旅行。我在中国见过各种各样的神父——有的雄心勃勃，有的抑郁，有的酗酒，有的花太多时间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而他不是这样的人。但这个地区对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个很难且棘手的地方，它是中国礼仪之争的发源地。吴神父来自附近的闽东教区，那里有一位被教会自科绝罚多年的主教。闽北天主教徒长期以来一直分为非官方和官方两个团体。多年来，吴神父能够获得非官方天主教徒的信任，这并非易事。



多年来，吴神父被任命为闽北主教的计划一直很明确，现在终于实现了。他的当选是个好消息，将对当地教会生活产生积极作用。然而，尚不清楚梵蒂冈为何任命他为邵武主教，而邵武是该地区的一个监牧区，中国政府不再承认这个监牧区。在中国的规划中，吴神父是闽北主教，而闽北的辖区比邵武大得多。尽管梵蒂冈新闻声称吴神父是在建阳（闽北州的新首府）被祝圣的，这表明政府希望他成为闽北教区的领头羊。此外，梵蒂冈并没有在闽北教区如前天一样建立了一个新的潍坊教区。在福建，似乎中梵之间的一些分歧仍未解决。

此进展既带来了希望，也带来了挑战。中国仍然对社会控制极为严厉，对天主教也不例外。我们必须观察长远事态的演变。目前，这是真正的进步，我们只能希望并祈祷情况会继续改善。

中梵临时协议于 2020 年和 2022 年的续签，今年 10 月将再次续签。尽管遭到强烈批评，但该协议似乎正在发挥作用，您觉得呢？

自 2018 年临时协议签署以来，已有 9 位主教在双方同意下被祝圣，其中 3 位是本周祝圣的。梵蒂冈还认可至少六位此前未经教宗任命而由国家批准的“非法”主教。中国教区的划分也逐渐变得清晰，协议正在推动事情向前发展。尽管仍有许多问题，但这是一个进步。每两年，协议必须进行评估并正式续签。但我们知道，协议本身是不够的。许多其他因素可能会干扰协议。近两年来，协议并未取得重大进展。正如帕罗林枢机主教（梵蒂冈国务卿）所说，这不是一项理想的协议，但在中国目前背景下，这是我们能达成的次优协议。2024 年 9 月，圣座将不得不再次决定如何处理该协议。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至关重要。在众多反华声音公开批评教宗方济各的对华策略背景下，如果情况没有任何改善，圣座将很难再续签或进一步发展该协议。

尽管中梵关系正在改善，但梵蒂冈对中国政府侵犯人权和迫害宗教（包括对基督徒和地下天主教徒的迫害）保持沉默。梵蒂冈是否为了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做出太多让步？

总体而言，梵蒂冈在指责某个国家（无论大小）之前都很谨慎。众所周知，在中美竞争中，

任何针对中国的言论都可能被解读成各种不同的指向。因此，我理解梵蒂冈的极度谨慎。但是，我也理解这个问题的深度。中国正竭尽全力，尽可能地利用它面前的每种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公平游戏。然而，在 2018 年，（根据与梵蒂冈达成的协议）中国首次公开承认，一个外国势力——教宗有权就中国的宗教事务发表意见，这是前所未有的。尽管背景复杂，紧张的政治气氛，但梵蒂冈还是能够与中国谈判，并从中共那里赢得某种信任和放松，这是积极的。

虽然还有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但这仍然在进步。中国愿意在任命任何主教之前听取中国当地主教和梵蒂冈的意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指责和对特殊的政权发动某种圣战很少能产生最好的结果。在越南、日本或韩国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殉道者，难道我们也想在中国发生类似的事情吗？不幸的是，我们知道中国如何对待一些少数宗教团体，认为一些少数民族对国家和民族的团结构成威胁。我们想告诉中国天主教徒与中共展开全面斗争吗？我认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既不符合福音的精神，也不会有成效。如果欧洲、美国和日本如此关心中国的宗教自由，他们应该把他们的大使从北京撤走，调到台北。今天，教宗的大使在台北，而不是在北京。梵蒂冈正在部署自己的外交，高度重视各方立场，拒绝任何反华议程。西方不应就中国问题对梵蒂冈说教。



2024 年 3 月 27 日，在建瓯吴奕顺主教与他的神父，教友们一起庆祝晋牧典礼。（Michel Chambon 拍摄，天亚社新闻）。

上海教务会议百年纪念大会

编辑组

历史概述¹

今年庆祝中国天主教会第一次全国主教会议（Concilium Sinense）百周年纪念，这一历史性事件于 1924 年在上海的圣依纳爵主教座堂举行，标志着中国本地教会使徒使命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突显了由本地主教和神父领导本地教会的重要性。

全国教务会议是在教宗本笃十五世的宗座通谕《夫至大》（Maximum Illud）背景下召开的，旨在将基督信仰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实际上，教宗已在 1919 年的通谕中强调，基督信仰并非任何国家的外来物，成为基督徒并不意味着屈服于外国势力。上海会议赞同这一观点，提倡中国教会自治，抵制和渗透到教会实践中的殖民主义思想。会议期间，为促进本土神职人员的发展，作出了许多重要决定。鼓



1924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12 日，第一次中国天主教主教会议在上海徐家汇主教座堂召开

1 资料来源：Giovanni Tridenti, 《Omnes》，5 月 17 日（导言），Salvatore Cernuzio, 《梵蒂冈新闻》，5 月 21 日（帕罗林枢机的讲话），6 月 5 日《信仰通讯》。

励那些来自亚洲国家的主教和神父承担起领导地方基督徒团体的责任，这标志着中国天主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会议旨在抵制殖民主义，推动发展本地教会的特性，包括：推动教区会议，以及修会会士与平信徒之间的会议，支持建立由教友领导的协会。

百年会议

在此次百年纪念之际，2024 年 5 月 21 日圣座福音传播部的宗座传信大学举办，主题为《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这次国际会议不仅是对历史的庆祝，更是将焦点集中在那次教务会议的经验上，领悟其重要性和天主教会在华历程的现实意义。上海主教沈斌、国务卿帕罗林枢机以及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出席了此次活动。塔格莱枢机并致闭幕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郑晓云教授和研究员刘国鹏教授等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以下内容中，《懷仁之驛》希望介绍萨尔瓦托雷·塞尔努齐奥（Salvatore Cernuzio）在梵蒂冈新闻网发布的部分反思。最后，我们将以教宗方济各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视频致辞作为结束语。

帕罗林枢机关于中国的讲话：服从教宗无损爱国

“教宗是世界上所有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无论他属于哪个国家。服从教宗不但无损爱自己的国家，而且能纯正并激发它”。一百多年前，首任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总主教这句仍合乎时宜的名言。帕罗林枢机指出，刚恒毅总主教 100 多年前就论述了教宗与全世界天主教徒之间的合一，阐明“这种共融是信仰不受外部政治利益影响的最佳保障，也是牢牢扎根于当地文化和社会的最佳保障”。刚总主教不顾困难、延误和阻力，坚持不懈的努力，确保基督的福音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使福音本地化，刚恒毅总主教是中国教务会议的组织和推动者，而那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天主教教务会议。



刚恒毅总主教

良好信徒和良好公民

宗座代表、宗座传信大学校长博诺莫（Vincenzo Buonomo）教授致欢迎词所说，这是一个“学术性的，而非庆祝性的”会议。随后，将播放教宗方济各向本届大会发表的视频讲话。这不是一次“历史重建”，而是对主教会议本身进行深刻的反思，探讨基督信息作为本土化的基础与参照，从而保证良好信徒的同时也是良好的公民”。教宗方济各在蒙古之行的最后一台弥撒中向中国人民致意时强调了这点，帕罗林枢机在讲话中也重申了这一思想。帕罗林枢机表示，刚恒毅总主教早在 100 年前就已表明：“教宗愿意中国天主教徒爱自己的国家并成为良好公民。教宗是天主的代表，他爱所有国家，犹如天主爱所有国家；教宗也爱你们高贵而伟大的中国，不将她放在任何其它国家之后。”

上海教务会议对于今日的重要价值

回顾历史，帕罗林枢机指出，尽管上海教务会议属于“特别会议的范畴”，但毫无疑问，“它具有更广泛的教会意义”。事实上，“那次的中国会议为许多其它传教国家成为模范，这些国家以中国会议为榜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为召开各自的全国会议作了准备”。帕罗林枢机认为，那次会议“对当今教会也具有很高的价值，在教宗方济各的邀请下，教会致力于对同道偕行进行反思”，让天主子民“成为教会生活有责任心的人和主角”。上海教务会议的神长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正如宗座代表刚恒毅所说的那样：“我们就像建造主教座堂的卑微工人，设计是建筑师提供的，但每个人都为这一伟大的建筑添砖加瓦。对我们来说，建筑师就是教宗。工人离开了，但主教座堂还在。”

从“外来传教”到“传教的教会”

刚恒毅总主教的这些思想是在既有积极一面，又呈现不平衡的情况中形成的。帕罗林枢机指出，这种不平衡表现在“几乎只有外国神职人员”，而且“一些传教界人士倾向由西方列强建立的保教权，以及由此确定的牧灵方式”。有鉴于此，刚总主教在本笃十五世《夫至大》宗座牧函的启发下，塑造了自己的传教和外交“策略”，决意召开一次在中国教会的教务会议。帕罗林枢机强调，从刚恒毅的观点来看，将“外来传教”的概念转变为“传教的教会”这一概念的紧迫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需要“促进本地神职人员的发展”。出于这个意念，“他支持在1926年为首批六位中国主教祝圣，并以同样的目的在次年成立了主徒会”。他还大力推崇中国艺术和建筑风格，“通过这些形式，实现天主教信仰融入中国本土文化”。帕罗林枢机回忆说，当时有很多人在媒体上攻击和批评他。但“他总是以远见应对批评”。

续签协议和固定性临在

刚恒毅总主教留下的遗产如今仍可看到，2018年至今，透过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彼此间的关系也得到了加强。帕罗林枢机在会议间隙说，“我们都关心协议得以续签，而且有些方面能有所进展”。枢机也表示，希望能“在中国有一种固定性的临在”。他说：“即使最初能不以宗座代表及圣座使馆的形式，但无论如何会增加且加深我们的接触。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沈斌主教与帕罗林枢机

一个本地化的教会

上海教区主教沈斌在发言中保证，将“不断把中国教会建设成一个合乎天主圣意，接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为当今中国社会喜悦的圣而公教会”。他提出天主教会在中国临在的4点深思，其中的第一点就是“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忠于基督福音”，即忠于“大公信仰”。他说：“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不断努力适应新的政治制度的同时，始终忠于自己的大公信仰。中国政府实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没有兴趣去改变天主教信仰，只希望天主教的神长教友站在中国人民利益的立场上，摆脱外国势力的控制。”

历史上的问题

沈斌主教也提到，“一些传教士具有强烈的欧洲文化优越感”，他们“甚至抱著利用基督宗教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的意图”。这样做，“必然遭到很多中国人的抵制以至于厌恶”，从而“妨碍了爱的福音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更大传播”。



1926年10月28日，庇护十一世教宗祝圣了六位中国籍主教。（画像来自南怀仁基金会档案）

教宗方济各在《中国教务会议百年：历史与当下》国际会议发表讲话

(...)

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的与会者们展望未来，他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当下。

在历史的进程中，教会走过了、并正在走一条又一条不可预见的道路，也包括了忍耐和考验的岁月。在中国，上主一路守护着天主子民的信德，无论是上海教务会议的前后，还是今天，天主子民的信德一直是指南针，为各个时期指引了道路。

与罗马主教共融的中国天主教徒行进在当今时代，在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中，以慈悲善工和爱德见证自己的信仰，并藉着他们的见证，为了和谐社会共处、建设共同家园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在我们看到的非人性化势力似乎要加速世界终结的时代，跟随耶稣的人热爱和平，并与所有致力于和平的人联合在一起。

252 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中国北部的墓园

告诉所有人一个讯息

韩德力神父

252 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中国逝世，他们分别安葬在整个华北地区的不同墓园中。他们的坟墓向中国和西方的人们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在此之前，需要向大家讲述这些墓园的历史背景，否则，就无法懂得这些墓园所要传达的讯息。

圣母圣心会传教士都是在 25 岁时，自由选择前往中国传教。他们居住在华北地区，在那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都没有回家看望过家人一次。19 世纪，许多比利时和荷兰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北方，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基督的福音，而且还改善华北人民的生活状况。他们在张家口东北 60 公里处的一个



圣母圣心会王守礼主教侍立在陶福音主教墓前，
原坟墓所在地位于呼和浩特公教医院大院。

山村——西湾子（崇礼县）传教，当时这里属于内蒙古。后来，他们也在热河、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大同等地传教。实际上，他们几乎踏遍了长约 4000 公里的整个华北地区。当时华北地区非常落后，没有路，他们只能骑马、驴或骆驼出行。农民的土地贫瘠不堪，孩子们没有学校，没有医生给病人治病。传教士们预先清楚这些困难，但他们未因此而退缩，依然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自 1865 年至 1955 年，在长达 90 年的时间里，共有 679 位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在中国北方的小乡村与贫穷的农民一起生活。他们中有 252

位在当地去世并被埋葬。有的传教士为主殉道，有 88 人死于伤寒，有的甚至在到达中国一年或两年后就去世了。他们接受了这一切，将其视为在中国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多么感人的故事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后的 50 年代，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所有外国传教士都被指控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帮凶，并被驱逐出中国。传教士们为此大为震惊，深信这一指控是不公正的，并拒不认罪。他们被迫离开了生活了几十年的第二故乡，伤心地离开了被他们视为家人的中国天主教信友。



司慰文神父、文华国神父、高德盛神父之墓，在银匠窑子

回到欧洲后，传教士们对已成为他们第二故乡的中国倍感思念。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九十年间，他们培养了 250 名中国神父，接替他们照管华北地区的教会。从起初，他们的目标就是将来把传教事业交给中国神父们管理，他们做到了且很成功。其中四位中国神父成为了主教，接管了集宁（乌盟）、赤峰、西湾子（崇礼）和绥远（呼和浩特）教区。他们还在鄂尔多斯的城川，建立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蒙古人的天主教团体。当中国主教接管教区后，他们获得了以维持教区神父们牧灵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和地产。

传教士们特别自豪的是，他们帮助贫苦农民改善了生活状况，他们认为这是对中国政府的回报，证明他们不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而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的社会发展工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圣母圣心会建造了灌溉系统，挖掘了总长超过 700 公里的大小运河。他们利用黄河水灌溉了数万公顷的农田，使贫瘠的土地变肥沃；从国外引进新的蔬菜和粮食种子帮助人民生产粮食。

据统计数字显示，到 1935 年，教会开办了 1000 所中小学，为数万名儿童、男孩和女孩提供教育，还开设了一所师范学校以培养有资质的教师。

- 1921 年，传教士在呼和浩特建立了公教医院，其中包括一所护士学校，是方圆 600 公里内设备最先进的医院。400 名中外籍医生和护士在华北各地的乡村小诊所工作，照顾乡村的病人，将需要特殊护理的病人送往位于中心地带的天主教公教医院。1949 年后，该医院发展成为现在的内蒙古医学院。

- 传教士们在 236 个村庄周围修建了围堡，以保护农民免受强盗们每年九月抢夺他们的粮食。

- 数位传教士在北京怀仁学苑从事语言、历史和其他科学方面的学术研究，并与北京辅仁大学合作研制出了预防斑疹伤寒的疫苗，挽救了成千上万人和许多传教士的生命。

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国际间合作，让传教士和天主教信众们感到非常自豪、加深了相互间的欣赏和友谊，这种关系不含有任何政治因素。但 1949 年后，传教士们突然被视为国家的敌人，不仅震惊了传教士，也震惊了当地的天主教信友。他们都认为这些指控是不公正的。中国当局回答说，1860 年的“不平等条约”逼迫中国允许传教士来华传教，他们被视为帝国主义者。



2018 年，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与总会长普库塔神父在西湾子墓前致敬。

自 1949 年以来，中国和传教士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吵不休：传教士坚称他们只是在中国从事人道主义和慈善工作，而中国政府则坚持认为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者。这种争吵阻碍了所有改善双方关系的尝试，而双方都需要为未来的友好关系做准备，超越过去的对抗，需要沟通和对话。这正是传教士的墓园和当时中国信友们所要传达的讯息，告诉所有人，不要把自己锁在过去！超越困惑，沟通、对话！——这就是圣母圣心会 252 位在中国的传教士墓园所传达的讯息。

要充分理解这一讯息，就需观察近年来中、西方为促进沟通和对话所采取的举措，以此作为超越过去戏剧性事件的基点。早在 1965 年，教会就在梵二文献《喜乐与希望 / Gaudium et Spes》宪章中，呼吁所有天主教徒与社会中的各种人生哲学和宗教进行沟通，增进了解和友谊。1978 年，邓小平实施了中国开放政策，促进与世界各国对话、交流与合作。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受到自身哲学的约束，中国希望通过寻求新的接触来摆脱过去的束缚。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为教会寻求新鲜空气，邓小平向世界开放中国，这是东、西方关系史上的两个历史性突破。陵园的讯息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本人也从这两次历史演变中备受鼓舞，在梵二大公会议的推动下，1982 年我在台湾创办了南怀仁基金会（Verbiest Foundation），这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宗旨是发展与中国教会和中国学术界的对话与合作。该基金会由鲁汶天主教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赞助，也是圣母圣心会对中国开放政策的积极回应。由此，我以南怀仁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访问了整个中国北方的学术研究机构 and 教会。我很荣幸地见到了天主教信友、神父和主教，并了解到他们与我们以前的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之间有着多么深厚的友谊。我最终来到中国，实现了我 16 岁时决定成为华北地区传教士的梦想。我访问了呼和浩特、宁夏、甘肃、热河，这些教区都是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们曾呕心沥血福传的地方。当中国信友向我讲述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故事时，他们的名字和面孔都一一呈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立刻意识到这是我传教生活中一个新的阶段。我不能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传福音，中国和中国教会也不需要我那样做。但我发现，只有通过教会的弟兄姐妹对话，聆听他们的痛苦和疑虑，了解他们在全新的中国社会如何应付生活，并向他们提供他们迫切希望听到的真诚反馈，以此完成我作为中国传教士的新使命。中国信友们焦急地寻求被肯定，因为他们试着找出在现代社会中、践行基督教信仰的一种新的方式。为此，要求传教士们和中国的基督徒应怀有新的传教态度和方法：聆听、交流，对新中国的本地教会采取新的态度。我必须了解当地的主教和信友们，然后传达给国内外的朋友和教会长上，因为很多国内外人士对此存在很多无知。中国国内的基督徒和国外的基督徒之间产生了人为的误解和偏见。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创造性的传教计划和开放性的时代。我发现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而教会中很少有人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还会见了中国学术研究机构非基督徒同事，并愉快地针对研究教会史项目达成一致，我们并不在意某些问题的内容上持不同意见，这是学术研究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在新世界中寻求相遇的一部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即使是政府部门，所有共产党员都是我的对话伙伴。他们向我清楚地解释了他们的无神论思想，有时甚至直言不讳阐述了他们将传教士看作帝国主义者的原因，我毫不犹豫地表达了我的不同观点，我对教会有过去发生的事情感到遗憾。这是一场



今日陶福音主教的墓碑
镶嵌在呼和浩特教堂的墙壁上



闵玉清主教之墓
24 顷地圣母圣心会墓地。

开诚布公的对话，而不是争吵，这并不妨碍我对中国人民及其古老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双方承认东西方文化中都有我们可以分享的价值，从而丰富彼此。我们都在寻求共同点，以便开展合作与交流。多年来，相互间的尊重与日俱增，在相遇的同时，友谊也随之加深。

1980至1990年，我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访问和丰富的接触。这一切让我发现了传教士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的首要任务是了解新中国，当时宣讲福音的时刻还没到，这是一个聆听的时代，一个耐心尝试超越过去创伤的时代。为此，需要相互理解，只有通过对话和沟通才能实现，这也是适合当今世俗化社会中的唯一态度。为了学习这种全新的态度，我们必须放弃一些传统的福传方式。其意义和重要性不亚于之前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做的，在未来，只有这新的态度才能被接受。

在那些年里，我曾多次拜访华北地区传教的传教士的墓，从我们圣母圣心会的史册上只知道他们的名字，但当我站在他们的墓前，聆听中国信友对他们所做的一切深怀感恩，令我感激涕零。我拜访：甘肃、西湾子、宁夏、朝阳（热河）等地圣母圣心会传教士们的陵园时，我默默地祈祷，痛苦地回忆着由于误解而遭受的苦难。

2008年，在老虎沟（热河），丹尼尔（Danneels）枢机与当地信友一起在墓园举行纪念仪式，为150年前埋葬在那里的传教士们祈祷，这个简单的仪式表达了对传教士们的崇敬之情。在文革期间，红卫兵曾亵渎一些传教士的坟墓，把遗骸扔进火里或河里。但当红卫兵走后，天主教的信友怀着悲痛的心情，偷偷收集了还能找到的骸骨，默默地修复被破坏的坟墓，正因他们的付出，传教士们的坟墓才得以保存至今。

2002年，我在宁夏有两次感触最深的经历。在我访问陕北教区时，我路过向阳时，意外地发现了1952年死于定边监狱的圣母圣心会沙智林（Antoon Renson）神父的墓。我曾读过圣母圣心会文怀德（Remie Van Hyfte）神父写的关于沙智林神父的生平及在狱中死亡的动人故事，两位神父曾在同一所监狱坐监。沙智林神父的脾气很大，但信友们都知道他心地善良，信友们视他为圣人景仰，常在他的坟墓前祈祷，还带了一些沙子作为圣髑留在家中。沙神父的比利时家人知道他死于狱中，但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甚至不知道他的坟墓是否还在。当我回到比利时，告诉他们，我去过他的墓地，并在那里为他祈祷，我还让他们看了我在沙智林神父神墓地前的照片，这是陪同我的一位好心警察拍的。



2018年丹尼尔枢机在老虎沟，
祝福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墓园。



2002年韩德力神父在沙智林神父墓前祈祷

同年，我在宁夏小桥畔瞻仰了英勇的石玛利亚修女的墓。1947年，圣母圣心会梅济鼎（Feeraert）神父死在她的怀抱中。她发现他时，他正在流血，因为在半夜，士兵们强迫他打开纳令沟（陕北）传教士的大门。当梅济鼎神父一打开大门，士兵们就开枪打死了他。石修女和一些基督徒听到声音赶过来，发现他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就把神父埋在了纳林沟（纳林河）。大革命



梅济鼎神父之墓

感觉这首诗所表达的精神具有历史性，它表达了在历经中国历史上、最具戏剧性和争议性岁月，那个时代传教士和中国信友们的真实感受，我们今天深感同受，相信也是阅读这篇圣母圣心会陵园史的朋友们的共同感受。

期间，红卫兵破毁了整个地区的教堂和传教士的坟墓。石修女为了保护他们敬爱的梅神父坟墓不被毁坏。她偷偷地把梅神父的遗骸挖出，装入塑料袋，背着塑料袋走了80公里的路，将遗骸重新安葬小桥畔新的墓地。我在梅济鼎神父的墓前瞻仰并祈祷后，我到距梅济鼎神父墓地仅50米远的地方，在伟大的中国石修女的墓前祈祷时，不禁感激涕零，流下了眼泪。

传教士的陵园和那个时代信友们的陵园都向我们传递同一讯息。那些对圣母圣心会在中国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应了解这一讯息。文章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结束这一文章，这首诗是由一位圣母圣心会在中国北方传教的传教士用中文写的。1961年，我在台湾时从一位年长的中国传教士那里得知了这首诗，他只记得几个字，但我记下了他所记得的内容，因为我



小桥畔围堡附近圣母圣心会传教士墓园

《我爱你，美丽的中国》

中国，我爱你，真的爱你，
你是那么的美丽，使我心旷神怡。
你的一粒沙，一粒沙，
一块黄泥；一块黄泥，
犹如我的血液，滋养我的细胞。
黄河的水，解除我灵饥渴，
一望无际的草原，使我心神安宁¹。

作者：蓝衡师神父，葉乐牧神父

1 栗鹏举神父（Albert Van Lierde，圣母圣心会）曾在北京的怀仁书苑（Verbist Academy）被软禁并遭受酷刑。1959年至1964年，我与他一起在台中（台湾）的圣神小修院生活和工作。1961年，栗鹏举神父告诉我他的同会蓝衡师（Ferdinand Leyns）神父在怀仁书苑期间创作的一首中文诗，这首诗表达了传教士们对中国的深厚情感，即使在被驱逐出中国后，一些人对他们仍存偏见，他们在忍受痛苦后，仍然热爱这片土地。

庆祝农历中国年

佳播



仁义书苑庆祝中国年

二十三、二十四……一直到农历正月十五。春节的高峰是除夕和农历正月初一。

中国春节有着悠久的历史。起源于早期人类的原始信仰与自然崇拜，由上古时代岁首祭祀演变而来，在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中国人民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习俗在传承发展中已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习俗。例如，春节前夕，家家户户会购买年货，准备丰盛的年夜饭。此外，人们会在春节前进行大扫除，象征着扫除过去一年的晦气，迎接新年的好运。扫尘、贴年红、吃年夜饭、守岁、游锣鼓、舞龙舞狮、闹花灯等。春节期间的活动包括：祈求新年好运、五谷丰登、祭拜风神、雨神、火神、太阳神和灶神，祈福禳灾，人们通过这些活动来满足实际需求。

贴年红

贴年红，即是贴春联、门神、年画、福字、横批、窗花等的统称，因这些是过年时贴的红色喜庆元素，所以统称为“贴年红”。贴年红是中华传统过年习俗，它反映了人民大众的风俗和信仰，增添喜庆的节日气氛，并寄予着人们对新年新生活的美好期盼。

送红包

长辈或父母通常会给孩子们发红包，里面装有压岁钱，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成长，快乐幸福。近年来，朋友之间通过微信发红包。

除夕 — 敬天祭祖

庆祝活动从祭天开始，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祭天是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一部分，后来发展成为对最高神“天”的崇拜。祭拜祖先是中国的传统习俗，象征子孙延绵，延续祖先的精神和传统。通过敬天祭祖，连接现在与所有的祖先的血脉相连，具有薪火相传的意义。通常在家里，一家之主会带领全家人聚集在祖先的牌位前，供奉香、酒、水果和鲜花等，然后全家人三次叩拜，以示对祖先的敬仰。这源于孔子的教诲“大孝尊天，以祖配天”，意指真正的孝顺应当是对天命和祖先的双重尊重。祭祖不仅是对逝者的悼念，更是家族成员之间团结和传承的象征。

这是我对中国人在庆祝农历新年方式的一点反思。中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拥有各种各样的“习俗”。例如，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中国北方家庭吃饺子，由于饺子的形状像金元宝，所以吃饺子象征“招财进宝”，寄托了人们对财富和好运的期望。在南方，人们吃汤圆，因为汤圆的形状是圆的，象征家庭“团团圆圆”。南方一些省份的人们还吃年糕，象征新的一年过的红红火火，表达了人们对未来生活蒸蒸日上的美好愿景。

农历新年开始时是以“百节年为首、四季春为先”。在传统意义上，春节从农历腊月初八、



新年庆祝

农历新年的第一天，烟花和爆竹点亮了天空，象征“除旧更新”，迎接新年的喜庆与繁荣。人们会早早起床，穿新衣，象征新的开始。人们彼此送上“恭喜发财，新年好”的祝福，大家会向长辈们拜年，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之后，人们会向亲友们道贺，祝愿大家新年快乐、事事如意！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许多中国人都会去墓地，在逝去的亲人墓前烧纸或烧假钱，并摆上一些酒或水果。到了清明节，中国人去墓地扫墓。近 20 年来，春节后，我国的一些天主教徒在新年期间也会去墓地，主要是为已故亲人祈祷，并在墓碑周围洒圣水。到了清明节，天主教徒再去墓地祈祷献鲜花。



天主教徒的新年庆祝

天主教徒除了随着中国传统习俗外，新年弥撒是他们最重要礼仪活动。在新年前夕，一家人到教堂参与感恩弥撒，感谢上主在过去一年的祝福与护佑。新年的当天，教堂还会举行祈福弥撒，主要祈求新的一年充满上主的恩典、平安幸福。弥撒中，神父会为信徒们祈求神圣的祝福，寓意着对新年的美好希望。有的地方在神父讲道后，开始举行敬天祭祖礼仪，以表达对天地和先人的敬意。敬拜天主意味着敬拜造物主，表达了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即尊重天主的法则，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敬天祭祖礼仪文本是将中国祭天祭祖礼仪与天主教福音精神相结合，天主教台湾主教团已于 1974 年编订了《祭祖礼规》，详细说明了天主教祭祖使用的牌位、教会礼仪和家庭礼仪的具体细节，读经运用圣经德训篇 44 章 1 至 15 节。中国祖先牌位象征着生者与死者之间的家庭共融，在感恩圣祭的餐桌中，全体信友一起庆祝人间天上的共融合一，将中国古老的文化习俗融入到崇尚孝道的礼仪中。

弥撒结束后，每个家庭回家享用丰盛的餐点。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共同进餐是春节庆祝活动的高峰。围坐在圆桌旁，相互问候，彼此和解，彼此鼓励，这是中国人重生和转变的时刻。

梵蒂冈庆祝中国新年¹

2024 年是龙年，教宗方济各接见意一中全国联合会代表团，庆祝该组织成立十周年和中国新年，联合会的成员们表演了传统舞蹈。

教宗方济各有机会欣赏中国的传统舞蹈，尤其是维切利中国武术学院的艺术家将舞龙舞狮的色彩带到梵蒂冈宗座大楼，让教宗象征性地为舞狮点睛。



教宗方济各借会面向表演杂技团提出挑战，要求他们在履行促进双边对话的使命时不要害怕承担风险。教宗说。正如我们所知，杂技演员擅长大胆可以说是“高危”的动作和表演；教宗观看着这杂技，并祝愿大家能够在对话的道路上永远勇于冒险，成为“和平与兄弟情谊的杂技演员”。

¹ 文本与图片来自亚洲新闻。



在四旬期（Lent），中国天主教徒有多种传统方式来表达和践行他们的信仰，大多数天主教徒在四旬期保持守斋的习惯，每周五拜苦路，在四旬期期间教会通常不举行婚礼弥撒。圣灰礼仪后，教会为老年人举行病人傅油圣事。近些年来，许多堂区在四旬期为慕道者准备领受洗礼，教友避静，明供圣体，教友们在网络平台上一同诵念玫瑰经等信仰培育活动。

在四旬期到来之际，许多教区的主教会发表牧函，邀请天主教徒克己、守斋、祈祷、悔改，尤其是关爱本地团体中正在受苦的人，特别是那些在精神上饥渴的人。主教们在牧函中强烈强调教宗方济各的《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中的主题。

“我邀请每个人来参加这个与我们家园和好的朝圣之旅，帮助它变得更加美丽，因为这一承诺关系到我们的个人尊严和最崇高的价值观。与此同时，让我坦诚地说明，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不会单单来自于个人的努力，而是首先来自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重大政治决定。”（请赞颂天主 69）

中国天主教徒越来越意识到，善度四旬期不仅包括传统的守斋祈祷，还包括回应福音的教导，关爱贫困者和保护地球。这些行动不仅是服务他人的具体方式，也是为当代以及后代子孙保护地球做出贡献的具体方式，以下是一些具体例子：

地球在呼唤

减少垃圾，循环利用水资源，自带购物袋，使用多次性筷子，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浪费食物，购买真正需要的物品，提倡有机种植蔬菜，减少使用农药，抵制消费主义等公益活动。

穷人在呼唤

为了帮助贫困群体，天主教徒为老年人和残疾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资助贫困家庭的学生，圣枝主日，组织慈善义卖活动。

志愿者团队致力于帮助经济困难的家庭学生完成高等教育学位，医护团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



北京北堂，甄选礼

免费医疗咨询，许多天主教徒自愿去养老院陪老人聊天、修指甲、理发，并带他们到户外享受阳光，甚至带他们登山或朝圣。邀请中、小学生为老人唱歌跳舞，而其他人在神父和修女的陪同下为孤寡老人打扫房间。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近 20-30 年来，人们的基本物质需求和欲望得到了更好的满足。但是，中国人民依然感到内心空虚，需要填满。因此，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寻找精神生活，寻求

神的渴望越来越强烈，所以，一些人出于不同的原因皈依了天主教，例如：

玛利亚是北京的一位两孩子的母亲。她的大儿子还没有大学毕业，小女儿还在读中学时，她的丈夫去世了。这个家庭面临巨大的变化，两个孩子突然失去了经济来源和精神支持，与母亲相依为命，感到生活无助。于是，他们来到教堂寻求帮助，且受到了天主教教理老师的热情接待，给他们简要介绍成人慕道班，全家人一起学习教会道理，教理班老师热情陪伴他们信仰之旅。教会的信友们主动伸出援手，给与经济上的支持，找到舒适且廉价的住处，为男孩安排工作，为女孩安排学业。教友们爱的行动，使一家三口感受到天主教大家庭的友爱与温暖，通过信仰培育和学习，最终一家人领受洗礼成为了基督徒。

若瑟是一位年轻的高中教师，突然得知自己得了癌症，使他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他开始寻求治疗，并渴望内心的平安。他前往北京接受医疗，在治疗期间，他来到天主教会寻求精神上的帮助。到了教堂，人们把他带到成人慕道班，在慕道过程中，他积极参与教会组织的信仰班级和小组学习，满怀热情，他的信仰迅速成长，最终成为了一名天主教徒，若瑟的情况特别是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普遍，慕道者接受洗礼后，一些人的心身灵得到彻底修复，而有些人在离世时获得了内心的平安。总之，到教堂寻求信仰的人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和情况，以下是北京教区参加慕道，走上信仰旅程的大概几种情况：

1. 教会吸引力。
2. 自己寻找。
3. 通过别人的引荐。
4. 自我醒悟。
5. 天主教信友扶持和陪伴慕道者找到天主。



成人慕道班，慕道者与催化员

在概述这一系列活动和宣传之后， 让新受洗者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这些故事感人至深且独一无二：

我的领洗感悟

崔有龙

我是在一个无信仰文化环境长大的，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无神论，大家都觉得宗教总会与迷信相关联，所以一直以来没有接触了解宗教相关的知识，直到研究生期间到上海旅游，走进了圣依纳爵天主教堂以后，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儿童唱经班的美妙音乐深深的打动了我，教友对教堂历史的讲解更加坚定了我对天主教的仰慕，就像耶稣说的那样，不是我们选择了天主，而是天主选择了我们，他在我人生迷茫的时候让我找到了信仰的方向，从此之后我愈加痴迷于天主教的历史以及《圣经》的阅读。偶然的机会看到北堂公众号慕道班的招生，我毫不犹豫的报名了。第一节慕道班课程是一个炎炎夏日，但内心是无法抗拒的欣喜，我终于找到了正规的团体组织，教室里挤满了人还有很多站着听的，我被陪伴员的热情打动了，他们都是年纪相当于我爷爷奶奶辈的，依然不知疲倦的给大家服务。在天主教地位越高的人，越是为人们服务的，这也是与当代社会规则相反的，也是让我佩服的教义。从夏日酷暑到冬日严寒，神父们孜孜不倦的为慕道者传道，帮助他们解除一些困惑。



今年北京北堂 158 位新领洗者

终于到了复活节领洗的日子，我可以正式的加入天主教大家庭了，领洗那天，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当裴冬神父为我实施坚振圣事时，橄榄油散发迷人的芳香，那一刻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眼睛早已泛着泪花，感谢天主拣选了我，我将用我的一生来证明认识天主的是正确的。

毛姆小说《刀锋》中写到埃利奥特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从圣公会改宗天主教，他将他的一切财富用于教堂的建设，我也希望成为埃利奥特那样为信仰付出一切的人。我回想起曾经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情景，我儿时曾爬到6层斜坡楼顶调皮玩耍，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稍有闪失就后果不堪设想。我曾被木棍扎入眼角鲜血直流，如果木棍稍微偏左一点点，如今的我就是个独眼龙。我曾骑摩托车因速度过快而摔飞翻滚数米，好在只是擦伤。还有无数个我不曾察觉的瞬间，都是天主把我从地狱中拉回来，就像耶稣3日后又复活了一样，也许我已经复活了无数次。每次参加周日弥撒活动都像是一次重生，把一周的污秽与罪恶清洗干净，找回内心的平静与祥和，重新回到天主为我们铺好的正轨，信仰之旅漫长而艰苦，我愿不断的祈祷，祈祷，祈祷，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

我受洗的故事

胡奥斯定

我是胡奥斯定，2024年复活节在北京北堂受洗，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为什么会去教会？为什么接受天主教信仰？你一定也很好奇，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故事和感受。

我来自中国山西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一些非常保守的传统，我们总是觉得羞于向别人表达我们对他人的爱或鼓励。小时候，我的父母很少对我说“我爱你”或“你真棒”，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我一直在努力变得更好，然而，还是没有得到回应。因此，童年的我总是感到不安，



有时还会自我怀疑。此外，在我的家庭历史中发生过一些悲剧，我的父亲在他 8 岁时因为他的父亲经常家暴，导致他的母亲自杀身亡。我的母亲从小被领养，并一直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这些经历夺走了他们的安全感，当他们有了我之后，这种不安全感就不自觉地传递给了我。

此外，我还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然而，在我未成年时，我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这不仅仅是因为信息匮乏，还因为我在学校被迫遵守一些严格的规定和时间表。虽然我很好奇，也一直在努力寻找，但却没有机会去探索和发现更多的真理。

幸运的是，我通过中国高考成功拿到了北京一所重点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有机会来到北京这座国际化大都市，我开始尝试新事物，接受新观念，但我的内心深处仍然没有停止寻找关于人生的真谛……直到 2022 年年底，我的内心感到巨大的空虚，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一个人被关在出租房里，我感到孤独，却没有人可以倾诉，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人真正关心我，我无所事事，开始回忆我的生活。然而，我只记得那些缺乏关心、缺乏安全感、无法满足好奇心的经历……我沉浸在这些糟糕的回忆和负面情绪中，我感到时间在我的身体里毫无意义地流淌，我却得不到任何帮助，我开始怨恨这个世界，我甚至想自杀来逃避……

“生命是虚假的，生命是虚无的”，我带着这些令人压抑的负面情绪来到了教堂，直到我看到一个景象：一些婴儿正在接受洗礼，完全被这种生命的力量所吸引和震撼，我站在教堂里，在弥撒中，站了好几个小时。从那以后，我常常被教堂里婴儿接受洗礼的一幕所吸引！我无法停止重温当时的景象和感觉。不久后，我有幸被邀请参加了北堂 55 期慕道班，我隐约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推动着我，我想知道它是否能治愈我的伤痛，事后验证非常有帮助。

我在教堂里认识了很多信主的人，他们的言行吸引了我，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了什么是美好生活，什么是爱。我聆听了神父修女的讲课，之前的一些困惑被打消，并且我接受了引领我们走向永生和自由的天主圣言。在圣神的指引下，在慕道班的信仰旅程陪伴中，我心灵的旷野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直奔。一段时间以后，终于等到了复活节。

那是一个宁静祥和的夜晚，我提前放空思绪，为那一刻做好准备，那一刻过后，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已经焕然一新，我之前所有的罪都得到了赦免，我被这种神圣的力量所感动，禁不住流下了眼泪。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停止重温圣水浇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刻，慈父般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受洗……所以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受造物，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格后 5: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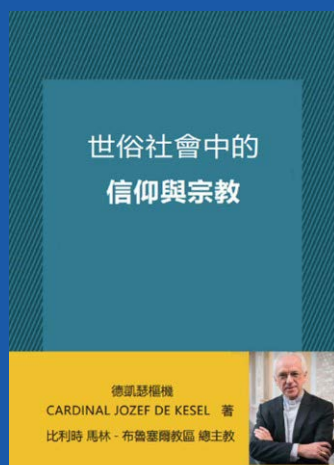
自从领洗认识耶稣以来，我一直在接受爱和付出爱，我目前已经参加了北堂青年唱经班和辅祭班两个团体，期待不久之后通过神父的培训就可以在弥撒中作为”唱经员”和”辅祭员”，为教会服务。此刻，我不仅是天主教会的一部分，更是主耶稣忠信的儿子，从此我将成为天主恩典的光和盐，直到永远。阿门，阿肋路亚！

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举办汉蒙研究

第十五届南怀仁研究中心国际论坛

教会与社会

2024 年 9 月 3 日— 9 月 6 日



多个国家的学者聚集鲁汶，以德凯塞尔（Joseph De Kesel）枢机的书作为研讨的主题：

“世俗社会中的信仰与宗教”

研讨会的主题思想是基于德凯塞尔枢机的著作，阐述教会与社会之间持续不断的对话。在我们这个时代，学者们将试着从牧灵和学术两个层面，从各自特定的文化角度，就“如何建立教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勾画答案。

三个副标题

世俗化 — 障碍与机遇

梵二 — 仍有工作要做

对话优先 — 与世界的关系

专家学者包括：

南怀仁基金会主席 Joseph De Kesel 枢机，
法国 Reims 的总主教 Eric de Moulins-Beaufort，
荷兰阿姆斯特丹 - Haarlem 教区的 Johannes Hendriks 主教，
中国承德教区郭金才主教，
熙笃会阿伯特（Abbot, OCSO）总会长 Dom Bernardus Peeters，
圣母圣心会总会长普库塔神父（Charles Phukuta），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教授多玛斯神父（Tomas Halik）

—— 注册 ——

关于学术会议的整个议程、信息和注册。

请联系 pieter.ackerman@fvi.kuleuven.be 或扫码。

地点：鲁汶大学 - Grote Aula, MTC 和 Aula Wolfspoort



南怀仁基金会 — 使命宣言 —

南怀仁基金会 (Ferdinand Verbiest Foundation 简称 VF) 在比利时鲁汶合法登记立案，由 VF 董事会指导，比利时 Jozef De Kesel 枢机担任主席。

圣母圣心会于 1981 年举行的第九次修会总大会时，针对修会过去曾在中国华北地区 90 年 (1865-1955) 传教历史，做了一次回顾与评估，并确立了一个新的方式来实现修会自 1862 年创办以来，由会祖南怀义神父 (Theophile Verbist) 在修会宪章订下的“中华优先”之福传使命。于是，圣母圣心会于 1983 年成立了 VF 来落实并更新圣母圣心会的“中华优先”原则。VF 的任务是与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以及全球华人 团体发展一个新的合作和交流关系。此后，VF 一直秉持这项使命，透过举办各种对话、合作和交流活动，来实践传统的圣母圣心会“中华优先之”使命。

近 23 年以来，VF 在台湾有今天的成就和发展，皆归功于圣母圣心会以及台湾平信徒和教会领袖的奉献精神与重要贡献。2006 年，圣母圣心会将 VF 转移到比利时的“鲁汶南怀仁基金会”，如今是合法登记立案机构。鉴于其宗旨并且对普世教会的开放，VF 不将自己视为隶属任何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它是一个“蒙福音和梵二精神启发的国际性天主教团体”。

VF 团体成员来自东西方，其包括教区神父、圣母圣心会、圣母圣心爱子会和圣母圣心修女会传教士、平信徒以及非基督徒成员，每位成员都基于自己的文化、社会和历史背景，为基金会的宗旨贡献力量。他们分别在鲁汶 (比利时) 和台北 (台湾) 的研究中心工作。VF 董事会也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董事会成员，这对于实现基金会的宗旨非常必要。

VF 愿意与“无神论”、“各类哲学思想”以及“不同宗教信仰”进行对话并且保持开放态度，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相互理解和兄弟情谊，同时在我们现代世俗化社会中追求进步和福祉。

“求同存异”最能够表达 VF 的宗旨，亦即我们与合作伙伴在对话中

找寻我们彼此有共识的议题，同时与我们抱不同观点的议题也表示彼此尊重。

VF 制定了三个活动计划来落实其宗旨：

1. 牧灵和社会交流与合作计划
2. 学术研究计划
3. 文化交流计划

在鲁汶，VF 有两个机构，两个机构同属一个管理单位，“鲁汶南怀仁研究中心”与天主教鲁汶大学合作，也使用“鲁汶大学”提供的办公室办公。另一个是“鲁汶仁义书苑”，它也称为“南怀仁基金会之家”，从事研究或参与 VF 活动的同仁住在“仁义书苑”，凡承认这是“普世基督徒兄弟友爱团体”者，方可在此屋檐下度团体生活。

在台湾，VF 尊重并承继台湾牧灵中心 (TPC) 的传统精神和部分项目，包括为牧灵人员提供牧灵、教理讲授和教会社会思想领域的培训计划。VF 希望能加强与辅仁大学的合作，这任务是交由台湾“中华南怀仁文化交流协会”负责。

了解并支持南怀仁基金会的中国计划

南怀仁基金会是以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而命名的，他是著名的天文学家，也是清康熙皇帝的老师。本基金会于 1982 年由圣母圣心会韩德力神父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创立。

南怀仁基金会由马林教区 Jozef De Kesel 枢机担任董事长，董事成员由圣母圣心会、圣母圣心爱子会以及圣母圣心修女会等组成。基金会赞助鲁汶大学南怀仁研究中心以及台北南怀仁研究中心（位于中央大楼八楼）的活动。自 2009 年 5 月 1 日起也赞助鲁汶仁义书院。透过这些机构，基金会积极推动中国教会史方面的学术研究，以及与中国教会牧灵合作交流。

南怀仁基金会的优先关怀是：与中国教会发展开放性对话交流，积极响应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牧函以及教宗方济各的对话之路。

帮助中华各地教会最有效之道，在于投入教会人员的培育。因此，本基金会对中华各地教会牧职人员（神父、修女、修士、教友）的培训提供支和奖学金，也邀请神职人员到欧洲、台湾或菲律宾的一些学院接受福传方面更专业的培育，期盼他们学成归国后，到各修院及培育机构授课。

白满思 (Paul Braeckmans) 先生是本基金会在美国的代表。

地址： 624 Washington street, Alhambra CA 91801, America.

E-mail: paulbraeckmans123@gmail.com

courier
懷仁之驛

Verbiest



Secretariat:

pieter.ackerman@fvi.kuleuven.be

Vlamingenstraat 1,
3000 Leuven

Redaction:

Pieter Ackerman, Jeroom, Heyndrickx,
Hugo Vanheeswijck.

Cooperateurs:

Marie-Cécile Herbecq, Tom McGuire

Responsible editor:

Verbiest Foundation